

研究論文

## 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 志願結社及日常接觸

傅仰止

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通訊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Email: fuyc@sinica.edu.tw。本文資料取自科技部補助計畫「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0-2012年調查。計畫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該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協助進行抽樣及面訪調查。原稿發表於「如何再創臺灣奇蹟：1990年代後的轉型、發展與挑戰」研討會（2013年10月5日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行）。初稿蒙評論人謝雨生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修訂稿之潛在類別模型依據張明宜、林文旭建議分析，資料及表格由李思穎協助分析整理，並承本刊編輯委員會及兩位審查人提供進一步修正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4/4/1，接受刊登：2014/6/30。

## 中文摘要

臺灣民衆在解嚴後是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社會參與的形式有何演變？都是瞭解公民意識的重要議題。最新研究顯示志願結社的趨勢下降，尤其是「工具性」社團參與式微，透露出公民意識似乎益趨薄弱，公民社會的發展面臨危機。本文透過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近年資料，擴大檢視兩種可能孕育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形式。「志願結社」直接測量正式的社會參與，「日常接觸」則涵蓋不拘內容的社會活動，兩者都和民衆的政治效能強度、公共議題討論頻率、公民責任義務的評估息息相關。近年來參加社團的趨勢下降，日常生活中的人際接觸則未減少，日常接觸也逐漸包含不認識的對象，初步顯露出即時短暫的社會互動跡象。從這些趨勢顯示，臺灣民衆參與社會的形式趨向多元化，社會連結的原則可能也隨著科技進展而有所調整。「志願結社」如同其他衆多概念，延續社會科學既有的研究傳承；「日常接觸」則依據古典社會學論述及近一世紀來的社會發展，在概念化和測量工具上另求創新，並以臺灣社會的調查研究成果爲主要依據，補足從「志願結社」來理解公民意識發展的思維。正如本文研究結果所顯示，公民意識發展的社會參與效應如何，應透過不同研究取徑來加以探索，以多方掌握社會變遷的重要面向。

**關鍵詞：**社會參與、志願結社、日常接觸、公民社會

**Social Participation Effects on Civic Consciousnes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Daily Contacts**

Yang-Chih F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a steady decline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Taiwan, which may hinder civil societ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formal social interactions. Using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I examine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trends vis-à-vis the degree of daily contacts, which I argue is a more encompassing typ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Similar to join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s, daily contact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urvey respondents' political efficacy, discussion of public issues, and normative perceptions of citizens' duties and obligations. The extent of daily contacts has remained high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lthough with some changing patterns. In particular, contacts with unknown others increased between 1997 and 2010, indicating more fleeting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a diversifying patter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at probably reflects macro-level trends in new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Keywords:** social participat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daily contact, civil society

## 一、前言

臺灣社會的民主制度運作已久，民衆參與社會團體活動的情況卻未必明顯提升。以「團體成員身分」或參加「志願結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或稱「參加社團」）來衡量，在1987年解嚴之後，民衆參加社團的趨勢只有短暫上升，到了1995年後便持續下降，其中又以工具性社團的參與率下降較為明顯。這種現象似乎反映出臺灣社會發展的一項困境，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人口大量增加後，「反而在社團參與上出現衰退趨勢，使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的公共性與市民政治反而萎縮」（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 97）。「社團參與率」下降，似乎也呼應歐美近年研究發現，多少透露出集體性的社會資本或公民意識轉趨薄弱，可能造成公民社會發展的危機（Putnam 1993, 2000）。本文重新審視這項社會現象背後的意涵、檢討「社團參與」指標的可能限制，並依據新創的概念化與近年實證資料，提議以日常接觸（daily contact）代表另一形式的社會參與，作為衡量公民意識的一項研究取徑。

「參加社團」是瞭解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途徑，也是展現民衆參與社會活動的常用具體指標。既有文獻強調自由結社及社團參與如何成為公民社會的發展基石，又如何彰顯參與民衆的社會資本（Paxton 2002; Putnam 2000）。團體運作通常有固定的制度規範，成員的社會互動多半受到種種制約，有利於培育公民意識。除了這種正式的團體內互動，其他的社會參與形式是否也有可能孕育公民意識？是否也像社團參與一樣，有效反映民衆對公民責任義務的認識與評估？正式的團體活動和參與顯而易見。相形之下，非正式的社會互動如何能夠展現「社會參與」的實質內涵？是否也有助於孕育公民意識？不同形式的非正式互動

又要如何測量？都是亟待探索的議題。

本文以這些問題作為出發點，探討兩種主要的社會參與形式。第一種形式延續「團體成員身分」或「參加志願結社」的研究傳承，第二種形式「日常接觸」則是依據古典社會學論述及21世紀的最新社會發展趨勢，經過概念化和測量上的嘗試，並累積十多年來在臺灣社會的調查結果，而發展出來的研究取徑。「志願結社」固然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項關鍵，畢竟無法涵蓋形形色色的各種社會參與形式。這道研究取徑雖然已經普及應用了數十年，卻逐漸受到時空限制，一方面無法反映隨著最新社會發展型態而起、短暫而片面社會連結的一面（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另一方面也難以顧及世界上社會型態迥異於歐美國家的其他社會。在這種時空環境挑戰之下，「志願結社」的研究取徑或可藉由涵蓋面廣泛、適用於各種社會參與內涵的「日常接觸」取徑來補足。

「志願結社」與「日常接觸」兩項研究取徑的發展各異其趣。前者歷經歐美社會科學界多年的概念化和資料驗證，普遍應用到全球各地研究，臺灣社會科學界自然也廣為接納。後者則企圖突破既有社會參與研究在概念化及測量上的現況，由臺灣出發，累積珍貴的實證資料後逐漸推廣到其他社會。

本文首先回顧這兩項研究取徑的發展，並回歸社會科學有關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論著，特別闡述日常接觸的概念化與測量基礎，然後檢視兩種形式的社會參與如何實際應用在探討臺灣近年來的公民意識發展背景。實證依據利用1990年至2012年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資料，揭示參加社團的趨勢。由於日常接觸的指標發展得比較晚，只能藉由1997年至2010年的資料來檢驗其趨勢。

比較兩種形式的演變後，本文再分別利用不同年份的資料，分析兩者如何有助於區辨和公民意識或公民社會息息相關的重要指標，例如政

治效能強度、討論公共議題頻率、對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評估等。分析目的在檢驗「日常接觸」這種新創的概念與測量，是否如同「志願結社」一樣有明顯的區辨效力。最後再進一步分析日常接觸對象當中，熟識者與陌生人的相對比例在近年來有何變化，並依據陌生人所占比例，從社團參與和日常接觸兩種形式著手，推論臺灣民衆如何藉由特定及一般的社會參與，擴展和不同類屬人群互動的機會，以培育公民意識發展所需的「異質性」特質。

## 二、志願結社和社會參與

依據歐美社會科學的論述及實證研究，民衆加入志願結社，通常有利於促進公民關懷周遭社會、投入公眾事務，可以視為民主制度的基石或先決條件。公民在參與社團事務以及和其他成員互動的過程中，可以更加瞭解人跟人之間的差異、增進人際信任、培養出互相尊重的規範（Huddy and Khatib 2007）。參加社團活動有這些收穫，提供社團成員更多機會孕育基本的民主價值，進而認識到身為公民應該有什麼樣的權利和義務。「志願結社」既然能夠發揮這種孕育民主價值與公民意識的功能，在全球化潮流屢次引發新興國家重大的政治社會轉型之際，顯得益形重要、愈加值得密切注意（Carothers 2002）。

美國學者依據各種實證數據，提出公民參加社團的比例呈現下降趨勢，不僅反映出公民對政治參與的熱誠減低，甚至可以推論為整體社會的社會資本或社會參與下滑（Putnam 1993, 2000）。國際合作計畫也經常透過共同的問卷調查題項，依據「參加社團」資料，比較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公民參與或社會資本。如此以參加社團的比例降低來推論社會資本或社會參與式微，進而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建基與運作，固然激起廣

泛迴響及警覺，也引發檢討及評論，尤其是社團成員的同質性通常較高、未必能夠發揮連結不同群體的作用。不同國家社會的志願結社歷史及政經背景不同，如果單以參加社團的數量或比例來衡量，也容易受限於這種特殊政經背景的發展，失之偏頗。

許多社團大多是同質性高的志願結社；有些社團固然包含各類成員，但是社團內部的互動也容易偏向物以類聚，不容易跨越自身的背景與旨趣。這種同質性包括共通的生命背景（例如同學會、同鄉會、宗親會等），或類似的職行業（例如獅子會、扶輪社等），或相同的生活型態與旨趣（例如各種休閒社團）。換言之，參加社團活動時，可能經常和同質性較高的成員互動。即使一開始不熟，也很容易基於共處於相同的副文化，志同道合，從陌生人變成同類（Fischer 1982, 1984）。尤其是參加許多「情感性」的社團，「會強化血緣、地緣和宗教的集體情感，是具有較封閉的社會控制連結（bonding）效應，而缺乏多元包容的鬆散結合跨地方性團體的橋樑性（bridging）連結的效應」（熊瑞梅等人 2010: 97）。

即使是工具性社團，也多半基於同樣政治理念、個人利益、理想或目的而組成。因此，這種社團雖然著重在制定規章、建立規範，在有秩序有秩序的社會互動中互相學習如何成為良好的公民，也很可能基於「同質互動」的原則，經常選擇和同類人在一起（Lin 2001a; McPherson and Smith-Lovin 1987），較沒機會領悟人群的變異、強化公民意識，因而未必有利於多元包容的溝通（Lowndes 2004）。

以「參加社團」這項指標來比較不同國家地區時，可能涉及其他議題有待釐清。例如有半數以上的北歐公民積極加入志願結社，但是同樣的參與形式卻無法解釋中東歐民衆對政治的涉入程度（Morales and Geurts 2007; Letki 2004; Newton 1997）。再以最近一項國際比較調查為

例，在十種不同類型的社團當中，美國民衆所參加的平均社團數目，大約是中國大陸民衆的十倍。<sup>1</sup> 歐美民主高度發展國家固然有著較為豐富多樣的志願結社，提供民衆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其他國家地區的民衆則可能依循既有的不同社會參與模式。如果依據上述參加正式社團的測量結果，進而推論美國人的社會參與大約是中國人社會參與的十倍，則不免過於武斷。其他國家地區的民衆，未嘗不可透過日常生活中比較不正式的管道，參與社會上各種活動。

因此，參加社團的數目是不是可以作為社會參與的有效指標，可不可以「充分代表實際、有意義的公民參與形式與程度」（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 2013: xv），的確值得進一步探究。如果向社會資本三項主要研究傳承借鏡，或可嘗試結合不同的研究觀點，用來探討更廣泛的社會參與議題。除了「信任」（trust）這項研究傳承之外，「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和「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兩項傳承都和社會參與密切相關（Lin 2001a, 2001b）。「參加社團」一向是「公民參與」傳承的常用測量，用來反映正式的社會參與形式；至於社會網絡則可以應用在各種非正式的社會參與形式。社會學研究經常藉助社會網絡觀點，用來分析形形色色的社會互動與社會參與形式。政治學探究的現象雖然比較偏向正式的制度或結社，近年來也藉由社會網絡傳承及測量工具來分析各種政治參與現象（Newton 1997; Mutz 2002; Siegel 2009）。「參加社團」的測量相對單純，社會網絡的測量則複雜得多。後者和前者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探討的範圍不限於志願結社等團體，而擴展到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人際互動。如何將社會網絡的研究取徑加以概念化，實地應用到日常生活，將是探索非正式社會參與的一大挑

---

<sup>1</sup> 依據「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跨國調查資料計算，參閱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Lin, Fu, and Chen(2014)。



戰與嘗試。

### 三、由日常接觸探索社會連結及公共參與

從志願結社的研究延伸到探討日常接觸，目的在於設法暫時跳脫正式參與的思維，擴大分析不同的社會參與形式。這種嘗試主要奠基於社會連結的經典論述，並考量到最新科技所帶來的變遷。依據古典社會學，人類的社會連結型態在工業革命、主要生產工具改變之後，經歷重大轉型。社會結構由原來以機械連帶為主軸，轉型為以有機連帶主導（Durkheim 1893），社會連結也由同心圓式的社會圈特色，轉型到以交叉重疊的社會圈（*intersecting or 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為特色（Simmel 1908, 1922）。到了20世紀末，傳播工具歷經巨大改變，社會連結再度顯露轉型跡象。既有交叉重疊的社會圈，逐漸發展出一圈圈由社會網絡軸心往外延伸成幅射狀、卻幾乎不交叉不重疊的一個個輪輻式（*spoke-like*）社會圈，成為另一項社會連結特色。在這種「後現代社會」的特色下，人際接觸偏向短暫，社會關係跨越到間接的連結，社會網絡結構多變（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 63）。

在網路世界的社群媒體崛起後，類似的即時簡短互動更加明顯。具有這種特色的互動在「後現代社會」興起，並不代表21世紀所有的社會互動都是如此，也不代表社會參與偏向這種互動形式，而是揭示一種前所未見的互動形式逐漸成形（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 54）。如果既有的社會科學概念化與測量工具無法涵蓋這種稍縱即逝的互動與接觸形式，將難以掌握最新的時代脈絡與新興的社會參與模式。由於即時短暫的互動多半不是透過社團參與，如果只以「團體成員身分」來衡量，將難以探測這種新興的社會參與。唯有同時測量非正式的社會互動及網

絡，才能概括更多元的社會參與形式。

社會網絡在實證測量上不如「參加社團」那麼直接，通常藉由特殊設計來間接推衍，其中又以定名法（name generator）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最為普遍（Laumann 1973; Burt 1984; Marsden 1990; Lin and Dumin 1986; Lin, Fu, and Hsung 2001）。由於設計出發點不同，前者容易藉由核心網絡探索當事人的情感性支持來源，後者則可以擴大到網絡邊陲，有利於揭示工具性的關係及其應用。兩項方法各有特色，也都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設計較為複雜，不容易普遍應用到各種社會調查，也未必能夠揭示廣泛的社會連結或參與。

本文採用的日常接觸法適用於分析社會連結與公共參與，與其他社會網絡測量有明顯區別。第一，這道方法從「接觸」來探索社會參與，與其他方法從「關係」來著手不同。後者著重於狀態，前者強調行動。第二，這項嘗試擴大範圍到「日常生活」，涵蓋面要比其他方法設定特殊情境（例如談心事、借錢等）或範疇（就業市場）要周延得多。因此，透過日常接觸所揭露的社會參與形式涉及實際的行動，不限情境或範疇，而且包含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場合中的人際互動。

當代實證社會學建構之初，就強調「接觸」在社會行動和社會參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社會互動初始過程中的接觸，通常會形塑、制約後續的互動階段。在深入而生動的經典質化研究中，不同的作者也強調應該以各種形式的接觸作為社會行動的最小分析單位，仔細觀察（Goffman 1967; Lofland 1976）。換言之，接觸可以視為社會行動的基礎；而日常生活中的人際接觸，也透過概念化成為直接簡便的問項，應用在大型社會調查中，得以估計個人網絡大小（Fu 2005a）。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日常接觸」這項概念透過不同研究設計，應用在大型社會調查。經過數次測試調整後，從1997年起以下列問題形

式，在不同年度的變遷調查和其他類似調查中重覆施測：

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總共大概跟多少人接觸？（包括點頭、打招呼、講話、打電話、寫信、透過電腦網路，對方是認識或不認識的都算。）(1)0-4人 (2)5-9人 (3)10-19人 (4)20-49人 (5)50-99人 (6)100人以上

由於這個概念及測量項目均屬新創，在文獻中沒有前例可循，所以經常遭遇不同提問，質疑其信度和效度。根據測試初期分析結果，「日常接觸」大致可以由下列幾點展現其初步的信效度（Fu 2005b）。

第一，問項內容明確易懂，等第類屬（ordinal categories）的選項容易選答。問項針對平均每天接觸人數，並對「接觸」下明確定義，減低問答或填答時的混淆。一般人通常無法細算每天到底接觸到多少人，但是很容易從六個等第類屬中，估計哪一個最接近自己的經驗。日常接觸問項的無效答案（不知道、拒答等），通常只占樣本的1.0%左右。例如在臺灣社會歷年23個電訪和自填問卷調查當中（總樣本數超過23,000），這個問項的無效答案大約占1.3%。而在同樣一批受訪者當中，不知道或拒答自己「今年幾歲」或「哪一年出生」的比例，剛好也占1.3%（Fu 2005b, Table 1）。<sup>2</sup> 換言之，問受訪者每天大概和多少人接觸，大約和問受訪者今年幾歲（或哪一年出生）一樣容易。<sup>3</sup>

<sup>2</sup> 由於變遷調查等面訪調查是依據戶籍人口資料抽樣，訪員已經知道受訪者的出生年，所以不適合計算年齡或出生年的無效答案比例。本段所舉實例，均為「社會意向調查」等電話訪問調查，以及其他郵寄問卷調查。

<sup>3</sup> 同樣的問項後來應用到國際比較調查，多國調查機構的代表（例如英國、西班牙、菲律賓等）也都反應這樣的題目設計相當容易回答，出乎原先意料之外。

第二，回答選項的比例大致呈現常態分配。以一般成年人口的調查結果來看，兩端所占比例最小（約在6-10%），中間兩類選項的比例最高（約在25%左右）。每次選項答案的偏態係數（skewness）大約接近零（在臺灣通常稍微偏向左側，也就是接觸人數較少的答案比例稍微偏高）。

第三，日常接觸人數的多寡，明顯地依若干基本的人口及社經背景而異。例如中年人接觸的人比較多，老年人的接觸人數則較少；教育程度較高、從事服務業者的日常接觸人數也偏多。在考慮就業及其他因素後，接觸人數並不因為性別或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而有顯著差異。

第四，日常接觸人數和其他測量社會資本或社會參與的指標結果密切吻合。不論是從「參加社團數目」、「參加休閒活動數目」、定名法常用的「親近朋友數目」、或定位法常用的「認識職業類別數」來比較，只要日常生活中接觸人數愈多的，這些不同指標的數值也愈高，幾乎沒有例外（Fu 2005b, Tables 3A, 3B）。因此，「日常接觸」問項可以透過相當直接簡便的設計，測量出和其他較複雜問項密切契合的答案。

第五，日常接觸的答案有助於區辨相關社會指標，例如接觸較多的人，所得比較高（林宗弘 2012），也相對比較快樂、比較容忍。依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初步測試結果，也發現日常接觸有助於解釋什麼是好公民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日常接觸甚至比參加社團和信任這兩項社會資本研究常用的指標，更能一致而有效地解釋公民責任義務「規範感知」（normative perceptions）的變異性。

既有的「日常接觸」問項穩定可靠，和其他社經特徵以及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密切相關，也有助於瞭解公民責任義務在規範感知上的變異，應該可以進一步應用來探討臺灣民衆的公民意識背景。以下實際分析將這項新指標和社會科學界慣用的「社團參與」指標交互應用，一方

面檢視兩項指標所揭示社會參與形式有何變化，另一方面分析兩者在公民意識議題的相對解釋潛能。最後以「接觸對象中陌生人所占比例」為實例，試探如何將日常接觸指標加以延伸，進一步探討社會參與的內涵。

## 四、變項與測量

本文分析的資料包括五大部分或組合。第一部分結合1990年至2012年的變遷調查資料，檢視社團參與數量的變化。第二，依據1997年至2010年變遷調查資料，展現日常接觸人數的歷年趨勢。第三，利用同時包含上列兩組測量變項的兩次調查資料（2004年問卷一、2012年問卷一），分析比較這兩項指標如何反映出社會參與和公民意識的重要傾向。第四，整理1997-2010年資料有關「接觸對象中熟識者和陌生人的相對比例」，看歷年變化。第五，以2005年問卷一為例，分析這種相對比例如何因人口特徵、社經地位、不同的社會參與形式而異。由於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分析涉及較多變項，相關變項及摘要均列於表1。

**表1 分析變項摘要**

A. 2004年問卷一「公民權組」（N=1,781）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公民責任義務				
水平觀點	0	1	-3.65	1.84
垂直觀點	0	1	-5.79	1.29
男性	.514	.499	0	1
年齡	44.6	17.2	18	98
年齡平方	2283.5	676.4	324	9604
已婚	.631	.483	0	1
教育程度	2.78	1.46	1	5
有工作	.606	.489	0	1

都市化程度	2.45	1.13	1	4
參加社團類別數	.97	1.13	0	5
參與潛在類別	1.18	.387	1	2
認識職業數	1.76	1.77	0	7
平均職業聲望	42.28	28.3	0	85
日常接觸	3.24	1.38	1	6

## B. 2005年問卷一「綜合組」(N=2,146)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陌生人比例	1.78	.75	1	3
男性	.500	.500	0	1
年齡	44.3	16.9	18	96
年齡平方	2245.9	1646.3	324	9216
已婚	.646	.478	0	1
教育程度	2.92	1.45	1	5
行業[無工作]	.250	.433	0	1
農林漁牧	.073	.260	0	1
製造營造	.258	.437	0	1
服務	.417	.493	0	1
都市化[鄉村]	.221	.415	0	1
城鎮	.582	.493	0	1
大都市	.196	.397	0	1
參加社團類別數	.451	.796	0	9
日常接觸	3.29	1.332	1	6

## C. 2012年問卷一「階層組」(N=2,134)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政治效能強度	0	1	-1.92	3.62
討論公共議題	0	1	-.92	3.13
男性	.503	.500	0	1
年齡	45.8	17.1	18	93
年齡平方	2390.9	1698.6	324	8649
已婚	.589	.491	0	1
教育程度	3.23	1.48	1	5
有工作	.638	.480	0	1
都市化程度	2.56	1.09	1	4
參加社團類別數	.537	.890	0	8
認識職業數	4.15	2.83	0	10
日常接觸				
親屬	2.18	1.07	1	5
非親屬	4.26	1.68	1	7

## （一）主要的社會參與變項

兩項社會參與形式當中，「志願結社」或「參加社團」的問項內容詳見附表1，「日常接觸」問項詳如上列。爲了呈現二十年來的「志願結社」變化，先以「至少參加一類社團的受訪者占多大比例」來比較不同年度的調查結果。在進一步分析時，則嘗試以兩項不同的「參加社團」指標來區別受訪者。第一，採用參加社團類別的數目，從數量本身來衡量參加社團的程度。第二，透過潛在類別分析的結果，依據參與度分爲高低兩組，從參加社團的類別和內涵來加以區分。

另一項重要的延伸變項，主要測量接觸對象是熟識者或陌生人的相對比例。實際問項通常置於「每天接觸多少人」的問項之後：

這些人裡面大概有多少是您認識的？

- (1) 幾乎都認識
- (2) 大部分認識
- (3) 大概一半認識，一半不認識
- (4) 大部分不認識
- (5) 幾乎都不認識

由於最後兩項的答案明顯偏低，實際分析時將五個選項合併爲三選項：(1) 幾乎都認識，(2) 大部分認識，(3) 至少有一半不認識（將原來的3-5選項併爲同一類）。

爲了彰顯日常接觸的獨立效應，在詳細分析時另外加入「定位法」社會資本（position-generated social capital）研究常用的兩項指標：「認識職業數」（原題是「在您認識的人當中，有沒有人從事下列這些職業？」通常在每次調查中列出不同數目的職業數，逐一問／勾選認識的職業）以及「認識職業當中的平均職業聲望」。數值愈大，代表受訪者的個人網絡愈廣，或者可以觸及（accessible）的職業地位愈高，可以動員的社會資本愈豐富（林南等 2010; Lin et al. 2001; Lin et al. 2014）。

## （二）依變項

爲了分析兩項社會參與形式如何反映公民意識、多元包容的傾向，下文分析以三項指標作爲依變項：（1）政治效能強度，（2）討論公共議題頻率，（3）對公民應盡責任和義務的規範感知。這三個變項強調公民社會應有的行爲和態度，分別從相關的態度及行爲量表，首先透過因素分析，再綜合計算出標準化分數來作爲代表。詳細的問項及因素分析，將在下文分析時分別詳列。第四項依變項則是將上述「接觸對象中認識者與陌生人的相對比例」轉化爲「接觸對象中的陌生人大致比例」。數值愈高，表示日常接觸的社會圈中陌生人所占比重愈高，代表一種異質性較高的社會參與形式。

## （三）自變項

人口特徵包括性別（男性=1，以女性=0爲對照組）、年齡、年齡平方（以檢測非線性關係）、婚姻狀況（已婚=1，對照組爲其他=0）。社經特徵以教育程度（國小或以下=1，國初中=2，高中職=3，專科=4，大學或以上=5）、有沒有工作（有工作=1，沒有工作=0爲對照組）兩者爲代表。在分析接觸對象的陌生人比例時（使用2005年間卷一資料），則將有工作的再依照行業別細分爲四類（農林漁牧業=1，製造及營造業=2，服務業=3，對照組是沒有工作=0）。

都市化的指標依調查年度分爲兩種。第一種是採用國際合作調查常用的主觀認定：「請問您認爲現在所居住的地方是都市或鄉村？」<sup>4</sup> 由

---

<sup>4</sup> 這道都市化問項普遍用在變遷調查所參與的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ISSP, [www.issp.org](http://www.issp.org)）和East Asian Social Survey（簡稱EASS, [www.eassda.org](http://www.eassda.org)）。



於最後一個選項「獨立農家」的比例太低，經過重組後，分為四個等第類屬：（1）農村，（2）小城鎮，（3）大都市旁的郊區，（4）大都市，數值愈高代表愈都市化。由於2004年問卷一和2012年問卷一都加入國際合作調查，所以分析時採用這種主觀認定。至於2005年問卷一則沒有這道問項，所以採用第二種分類：參考變遷調查抽樣架構的城鄉分層（侯佩君、杜素豪、廖培珊、洪永泰、章英華 2008；章英華、傅仰止 2006；章英華、傅仰止、張苙雲、瞿海源 2012），將樣本鄉鎮市區分為三個等第類屬：鄉村、城鎮、大都市（詳見表1）。

## 五、志願結社與日常接觸的變化趨勢

「志願結社」或「參加社團」的概念看似單純，但是在實際設計問卷題目、選取各年調查資料、操作比較分析時，卻常碰到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樣的團體算是「社團」？志願結社或社會團體的類型繁多，無法完整一一列出，問卷調查通常列出主要的團體類別，再分別舉例。由於每次調查所列舉的類別不大一致，所舉的例子也經常有所增減，所以不容易客觀地跨年比較。最簡單而一致的標準，應該是以「至少參加一類社團」者占多大比例來衡量比較。<sup>5</sup>

第二，如何界定「參加」？是否以具名加入為會員或實際參與活動為主？變遷調查從1990年到2007年的問卷以「您目前參加了哪些社會團體」作為標準問項，2012年問卷一（配合EASS調查的共同問項）則問「請問您目前是不是以下組織／社團／團體的成員？如果是的話，請問

---

<sup>5</sup> 由於選項是列出社團的類別，確切的意義應該是在計算受訪者參加了「幾類」社團，而不是參加幾個社團。因此，這項指標的正確操作定義是「至少參加一類社團」。

您是不是積極地參與組織／社團／團體活動？」選項也分為「是，積極參與活動」和「是，但很少參與活動」兩類。

為了延續既有文獻的比較研究價值，本文首先採用熊瑞梅等人（2010）的操作定義及分類來界定「參加社團」：凡是參加團體，不論有沒有積極參與活動都算，也就是以「團體成員身分」作為操作定義，並以「至少參加一類社團」的比例來比較歷年趨勢。參加社團類別的數目除了全部類型的總數之外，並將所有團體類別區分為工具性和情感性，分別檢視歷年趨勢。由於2010年綜合問卷組沒有這個問題，本文加入2012年社會階層組（問卷一）資料，一共依據1990年至2012年間，共9次調查資料。

如圖1所列，將近有一半的臺灣民眾在1990年代初期至少參加一類社團。參加的比例隨後下降，尤其到了21世紀後更為明顯，以2005年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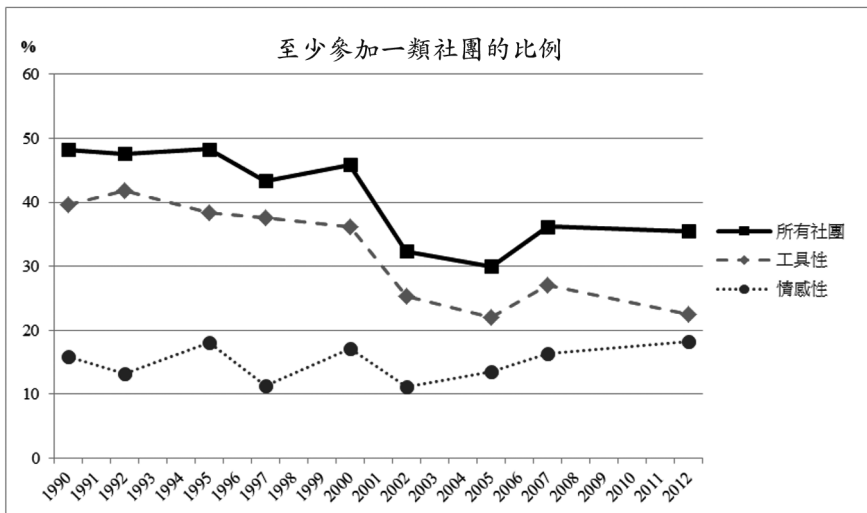


圖 1 臺灣民眾參加社會團體比例趨勢，1990-2012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調查（每年比例詳見附表1）

註：依照熊瑞梅等人（2010）分類標準更新計算

低，降到約30%。2007年後略微回升，2012年也沒有太大變化，比二十年前的社團參加比例降了至少10個百分點（數字詳見附表1）。

「至少參加一類工具性社團比例」的變化趨勢和整體的趨勢類似：1990年代初期比較普遍（約40%左右），從21世紀開始則明顯下降，只有2007年稍微回升，2012年再度下降到約22.5%。其中下降最明顯的是職業類別團體和政治團體。至於情感性社團的參加比例，則在21世紀初短暫下降後，逐漸回升，到了2012年略超過1995年的最高點，比例上升最明顯的是宗教團體，也是「情感性社團」中最普遍的類別。爲了釐清這項趨勢是否受到各年代的不同樣本特性所影響，本文接著將重要的人口特性列入考量，再檢驗各調查年代的效應。

從更新的趨勢來判斷，臺灣民衆參加社團的比例並沒有持續回升。但是工具性類別和情感性類別的社團參與趨勢相當不同，前者明顯下降，後者逐漸上升，兩者間的差距從二十多年前的24個百分點，縮減到4個百分點。這種變化，是否真的反映出臺灣民衆藉由「工具性社團參與」來培養公民社會能力及素養的機會一再減弱，而「情感性社團參與」的增加又無助於孕育這種公民社會所需的重要元素？

工具性社團和情感性社團的區別，或許在理論上和公民意識有重要關聯，但是這種關聯是否能夠藉由妥當的概念化、測量、分類來落實和呈現？本文對理論上的關聯無法細究，但是依實際測量的項目來評估，至少可以提出若干疑點，尤其是公民社會的能力需要什麼樣的社團來訓練培養。例如二十多年來下降最明顯的工具性社團「職業團體」，依其定義，成員都是同一職行業的廣義同事，在職場上經歷衆多共同的處境，這種主要面向（職業）上同質性這麼高的社團，真的能夠提供成員接觸多元價值、學習包容的機會嗎？再以成員增加最明顯的情感性社團「宗教團體」，固然也是基於共同的信仰和理念來吸引成員，可是衆多

成員從各行各業前來聚會，加上社團內的制度化，真的就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多元包容的公民社會價值嗎？

這些問題背後涉及錯綜複雜的因素，恐怕沒有簡單的答案；參加社團和公民意識之間的關聯，也難以從簡化的參加社團類別數目或比例來確實理解。本文在檢驗志願結社的效應時，除了依據簡單的參加社團類別數目之外，另外嘗試藉由標準潛在類別分析，以高參與和低參與類別來分析。

但是在比較不同時空的社會時，畢竟需要一些簡化可行的測量方式來作為初步指標；在錯綜複雜的關聯現象之上，或許也可以或應該歸納出比較直接的原則，廣泛應用在瞭解宏觀的趨勢。和「參加社團」比起來，「日常接觸」可能更加直接而簡化，也更能涵蓋形形色色的社會參與內容。

根據1997年至2010年共9年度13份問卷調查資料，臺灣民衆每天接觸人數低於5人或至少100人的比例，幾乎都不到10%，而在中間兩類屬（10-19人、20-49人）的比例，都超過20%。大致而言，每年分布似乎都相當穩定（表2）。為了更清楚呈現趨勢，可以分別比較歷年來每天

**表 2 日常接觸人數比例，1997-2010 (%)**

大約 人數	1997	200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10	合計
0-4	8.7	9.7	10.3	10.3	9.6	9.1	9.6	7.9	6.4	9.3
5-9	19.9	18.3	19.4	21.2	20.3	19.1	22.4	20.7	14.4	19.8
10-19	27.7	29.7	28.1	29.1	28.4	31.2	30.6	28.4	29.9	29.1
20-49	23.7	24.2	23.7	21.7	24.0	24.3	23.1	25.3	27.8	24.1
50-99	11.1	10.1	9.2	9.3	9.5	10.0	8.3	10.0	11.8	9.7
>100	8.9	8.0	9.3	8.4	8.2	6.3	6.0	7.7	9.7	8.0
樣本數	2,825	3,796	3,693	1,779	4,303	2,106	4,174	2,024	1,890	26,59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77年至2010年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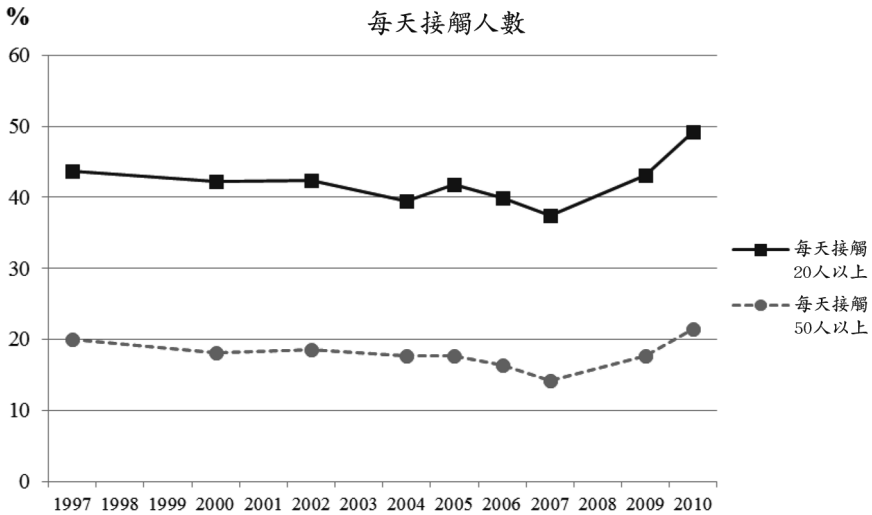


圖2 臺灣民眾日常生活接觸人數比例趨勢，1997-201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調查（每年比例詳見表2）

接觸20人以上、50人以上的比例（圖2）。這兩項比例也都從2000年後有些微下降，到了2007年最低，可是2009、2010兩年都上升。初步判斷，接觸人數較多所占的比例在前十年變化不大，到了後面兩年則上升不少。

依據社會網絡一項常見原則，網絡愈大，內部異質性愈高。如前述，接觸人數也和各種網絡大小的測量結果相當貼近。每天接觸人數不到10人或20人的民衆，網絡內部的異質程度可能不明顯，可是每天接觸20人以上，甚至50人以上，就很可能更常接觸不熟的人、透過間接關係接洽的人、甚至完全不熟的陌生人。經常和這些離自己網絡核心較遠的對象接觸，是不是也就有更多機會學習和不同人群相處、磨練和公民意識相關的技巧和能力？爲了加強這種推論和連結，下文以三項和公民意識或公民社會密切相關的議題爲例，檢驗並比較「參加社團」和「日常

接觸」兩者和這些議題有何關聯。

## 六、政治效能、公共議題與公民責任義務

公民社會的素養可以透過什麼機制來展現？有什麼行為或態度認知能夠代表強烈的公民意識？本文以受訪者「對政治效能的感受」、「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對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等三項，作為這類機制的實例，分析「參加社團」、「日常接觸」兩者對這些行為態度或感知有沒有明顯的區辨效應。分析的目的，在於檢視並比較不同的社會參與形式所反映的公民意識意涵。

「政治效能感受」取自2012年問卷一和政治社會議題有關的量表（附表2A）。經過因素分析、斜交轉軸後，量表中和政治效能密切相關的三項問項可以歸納為第二因素的主要項目。第二因素轉化為標準化分數代表「政治效能感受」的強度，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愈認為「對政府的作為有影響力」、「要瞭解政府與政治的運作，並不會太複雜」、「個人對政治方面有興趣」。由於依變項已經轉化為標準化分數（平均數為0，標準差為1），所以採用迴歸分析。

和社會參與有關的變項當中，「志願結社」以「加入團體（類別）數」測量（表1C）。問卷中一共列出9類社團，加上「其他」類，一共有10類社團可以選擇。「日常接觸」問項在歷年變遷調查都維持固定問法，但是2012年問卷一有所改變。因此，2012年的資料分別以每天接觸的「親屬人數」（實際上是指不同住的家人親屬）和「非親屬人數」兩項變項來分析，但是沒有整體的人數，選項類屬也不一樣。由於選項答案較偏，前者原有的8項合併為5項，後者的8項則合併為7項。<sup>6</sup> 為了和

<sup>6</sup> 「接觸不同住的親屬人數」選項中，沒有受訪者選擇100人以上，而選擇10人以

常用的社會網絡指標比較，另外加入「認識職業數」（從所列出的10項職業中，加總計算受訪者選答的項目數）。當控制人口特徵、社經背景、都市化等變項，再逐步檢驗上述三項社會參與或社會網絡變項時，三者的效應並沒有明顯變化（也沒有明顯影響到彼此的效應），所以在表中只列出最後的模型（表3，模型一）。

**表 3 政治效能強度與討論公共議題背景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一、政治效能，二、討論公共議題，兩者均為標準化分數）

自變項	政治效能 模型一	討論公共議題 模型二
男性[女性=0]	.199(.045)***	-.040(.041)
年齡	.014(.009)	.014(.008)
年齡平方	.000(.000)	.000(.000)*
已婚[其他=0]	-.120(.056)*	-.105(.050)*
教育程度(1-5)	.108(.022)***	.076(.020)***
有工作[沒工作=0]	-.142(.054)**	-.025(.050)
都市化(1-4)	.046(.021)*	.004(.020)
加入團體數(0-8)	.135(.026)***	.115(.024)***
認識職業數(0-10)	.041(.009)***	.094(.008)***
日常接觸		
親屬(1-5)	.048(.022)*	.035(.020)
非親屬(1-7)	.016(.015)	.053(.014)***
常數	-1.073(.222)***	-1.124(.200)***
樣本數	1,833	2,029
調整後R <sup>2</sup>	.113	.188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問卷一「社會階層組」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依變項標準化分數均依據因素分析轉化，詳見附表2A、附表2B。

\* p < .05, \*\* p < .01, \*\*\* p < .001

政治效能強度的人口及社經背景效應大致符合預期，尤其是男性、

上所有四個選項的比例，全部加起來也只占3.1%，所以均合併為一項，一共只有5項。「接觸非親屬人數」的8個選項中，也將最後兩項比例合併（兩者加起來不到10%），一共有7項。

教育程度高、都會區的受訪者對政治比較有興趣，也認為比較能夠瞭解政治，比較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作為。在人口及社經背景相當的前提下，如果加入愈多類型的社團，認識的人散布在愈多不同的職業，則政治效能的感受也愈強。日常接觸的效應則不太一致，只有「接觸不同住親屬人數」和政治效能強度有顯著關聯，接觸非親屬人數的關聯則不顯著。由於接觸親屬人數和接觸非親屬人數都已經排除同住家人，這兩項指標應該能夠顯示在家庭之外的人際接觸狀況。雖然只有接觸親屬和政治效能顯著相關，和公共參與涉及接觸不同人群的傾向不盡相同，但是在同時考量人口特徵、社經背景、都市化程度、參加社團、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時，這項日常接觸測量還能夠有助於區辨政治效能的主觀感受，表示日常接觸應該能夠補足參加社團、其他社會網絡測量變項所無法涵蓋的面向，顯現出另一形式社會參與的重要性。

第二個依變項顯示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如附表2B所示，這個依變項原來包括四道問項，在透過因素分析後，進一步採各問項的因素分數，合併建構成標準化分數來分析（Cronbach alpha係數達 .863）。分數愈高，表示愈常和三個人以上一起討論社區或地方上的環境、教育、防災、消費者權益議題，愈能夠實際投入時間精力來談論與公眾福祉相關的議題。討論公共議題的人口和社經背景效應，有一部分類似政治效能強度的分析結果，尤其是教育程度的正向效應相當一致而顯著，但是性別和都市化則沒有顯著效應（表3，模型二）。

和政治效能強度的發現一樣，在控制人口及社經背景後，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隨著加入社團類別數、熟識者所散布的職業數而有明顯提升。例如每多參加一類社團，討論頻率（標準化分數）就增加0.115；每多認識一種職業的人，分數也增加0.094。由於加入社團數的數值是從0到8，認識職業數的數值從0到10，衡量每個單位所可能增加的分數，實



質的幅度都相當可觀；和標準誤一併衡量之下，這兩項增加幅度也都達到高度統計顯著水準。

即使控制人口及社經背景的效應，再同時考量「加入團體數」和「認識職業數」後，日常接觸還是能夠有效分辨誰比較常討論公共議題。雖然「接觸親屬人數」的效應不顯著，「接觸非親屬人數」卻是主要因素：在7個等第選項類屬中，每提升一個等第，分數就增加0.053，也就是從第1到第7個類屬，標準分數增加0.318，占了將近三分之一個標準差，達到 .001的統計顯著水準。因此，「接觸非親屬人數」的絕對效應，或許比不上「加入社團數」和「認識職業數」，但是即使同時考慮了這兩項社會參與和社會網絡普遍採用的測量變項，日常接觸這項新的概念及測量仍然發揮部分功用，能夠明顯而有效地區辨到底是哪些臺灣民衆經常討論公共議題。

單一的日常接觸問項，通常能夠讓受訪者更直接估計每天接觸的總人數，而選項分布也經過數次測試調整，在十多年來呈現相當穩定的分布。以下再透過這種單一問項，嘗試瞭解和公民意識議題密切相關的另一項態度：「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

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應該盡什麼義務，負什麼責任，才能成為好公民？這種問題看似單純，實際上在不同的社會之間，或者同一社會的不同人群之間，卻未必都有共識。在明定的法律之外，民衆必須符合什麼樣的規範或期望，才能發揮公民社會的特質？這類議題也可能引發不同的觀點或感知。這種規範式的感知，是否隨著社會參與的程度而強化？相對於文獻上慣用的社團參與概念，「日常接觸」又如何有助於解釋這項特定的規範感知？

變遷調查2004年問卷一「公民權組」納入該年ISSP調查的核心題組，一開始就以下列題組施測受訪者對於公民責任或義務的看法：

怎麼樣才算是一位好公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如果1表示「一點都不重要」，7表示「非常重要」；那麼，請問您個人認為下列各種說法，對作為一個好公民的重要程度是怎樣？  
(選項詳見附表2C)

除了最後一項「說法」外，其他幾項責任或義務可以透過因素分析，大致歸為兩類因素，反映民衆的「感知」或「觀點」。<sup>7</sup> 第一類因素一般稱為規範感知的「水平觀點」(horizontal perspective)，主要是指公民在橫向間彼此關懷尊重的感受和態度，例如：「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儘量去了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為了政治的或倫理(道德)的或環保的考慮去買；幫助國內(臺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Cronbach alpha 係數約0.662，附表2C)。第二類因素主要是關於公民和政治制度之間的責任和義務，稱為「垂直觀點」(vertical perspective)；例如：「選舉都去投票；從不逃漏稅；遵守法律與規定；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Cronbach alpha係數約0.729)。這兩類觀點著重不同面向的公民責任與義務，是否也受到不同的人口特徵、社經背景、社會參與形式所形塑？兩項依變項同樣都轉化為標準化分數來進行迴歸分析。

以水平觀點為例，可以從兩項人口及社經特徵看得出來明顯的背景差異：男性和有工作的受訪者，明顯地比較不認同以橫向的互相關懷尊重作為「好公民」的標準。在這些人口及社經特徵相當的前提下，兩種主要社會參與形式都可以清楚區辨水平觀點的內部差異：加入團數的類

---

<sup>7</sup> 原有題組最後一項(國家有需要時，願意當兵)涉及不同的兵役制度，在理論上和公民社會的特質相隔較遠，在ISSP各國分析資料和討論時，一再指出難以和其他的公民責任義務並論，在後續修正題目也已經刪除，所以本文不列入分析。

別數愈多 ( $b=0.115$ ,  $p<.001$ , 表4, 模型三), 或者日常接觸人數愈多 ( $b=0.056$ ,  $p<.01$ ), 都愈容易體會好公民應該積極參與、瞭解並幫助其他人、在消費時也要考量到怎麼樣對社會比較好。一旦考量這兩種參與形式 (以及其他相關背景) 後, 「認識職業數」的區辨力變得不顯

**表4 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背景迴歸分析**

(依變項均為標準化分數)

自變項	以數量衡量		以內涵衡量	
	水平觀點 模型三	垂直觀點 模型四	水平觀點 模型五	垂直觀點 模型六
男性[女性=0]	-.171(.050)***	-.000(.049)	-.158(.050)**	.002(.049)
年齡	-.005(.010)	.050(.010)***	-.003(.010)	.049(.010)***
年齡平方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已婚[其他=0]	.119(.064)	.101(.063)	.125(.064)	.099(.063)
教育程度(1-5)	.029(.023)	.039(.023)	.039(.023)	.038(.022)
有工作 [沒工作=0]	-.123(.059)*	-.145(.058)*	-.125(.059)*	-.144(.058)*
都市化(1-4)	.005(.023)	-.012(.022)	.016(.023)	-.008(.023)
加入團體數(0-5)	.115(.023)***	.058(.023)*		
高參與 [低參與=0]			.208(.064)**	.082(.063)
認識職業(0-7)	.016(.015)	-.018(.015)		
認識職業的 平均聲望			.003(.001)**	.001(.001)
日常接觸(1-6)	.056(.020)**	.068(.019)***	.055(.020)**	.064(.019)**
常數	-.200(.228)	-1.57(.226)***	-.319(.226)	-1.57(.223)***
樣本數	1,634	1,634	1,634	1,634
調整後R <sup>2</sup>	.034	.059	.035	.062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4年問卷一「公民權組」

註：1.括號內為標準誤。

2.依變項標準化分數均依據因素分析轉化，詳見附表2C。

3.本次調查只問五類社團：(1)政黨，(2)工會、工商同業公會、職業同業公會，(3)宗教團體或教會，(4)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5)其他自願性社團。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著。<sup>8</sup>

換言之，當教育程度相同、其他人口及社經背景也類似時，每多參加一種社團，「水平觀點」的標準化分數平均就提升0.115個標準差；參加社團的確是瞭解水平式公民責任義務規範的一項重要因素。可是即使人口特徵和社經背景類似、所參加社團類別數目也一樣，只要平常每天接觸的人比別人多，這種水平觀點也就更加明顯。「加入社團數」的顯著作用無法由個人背景和認識職業數、日常接觸等加以解釋；「日常接觸」的作用同樣也難以歸因於個人背景和其他社會參與形式。兩項社會參與的形式，可以並列為瞭解公民責任義務規範的重要因素。

垂直式觀點的變異，也不容易從人口特徵或社經背景來加以區別，同樣只有兩項背景有顯著效應。年紀愈大，愈認同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直向責任義務（年齡平方的效應也顯著，更彰顯年紀的效應），有工作的人則比較不認同「投票、納稅、守法」這些行為是「好公民」的要件。

在人口和社經背景相當的前提下，參加社團仍然是區別「垂直式觀點」的重要因素。每多加入一類社團，垂直式觀點分數就升高 0.058 ( $p < .05$ , 表4, 模型四)。日常接觸的效應也一樣正向而顯著，接觸人數每增加一個類屬（例如從5-9人到10-19人），標準分數就升高 0.068 ( $p < .001$ )。由於2004年調查只問五種社團的類別，「參加社團數」最小值是0，最大值為5（表1A），所以參加五種類別社團者，在垂直式觀點的標準分數要比都沒有參加社團者高出 0.290；而日常接觸人數的類別最低組為1，最高組為6，所以每天接觸100人以上者，標準分數要比

---

<sup>8</sup> 「日常接觸人數」和「參加社團類別數」的相關係數約0.151，和「認識職業數」的相關約0.225。因此，日常接觸雖然和志願結社、社會資本都有關聯，但是重疊不太明顯（兩項相關係數都比後兩者彼此之間的相關  $r=0.336$  來得低），也著重在實際接觸，可視為衡量不同面向的指標。

接觸0-4人者高出0.340；不論從絕對數值和相對統計顯著水準來衡量，日常接觸所發揮的作用都不遜於參加社團。因此，藉由公民責任義務來分析，日常接觸大致和參加社團一樣，能夠有效區辨公民社會應有的規範。

上述不同的社會參與形式，以「參加社團類別數」本身就可以明顯區分公民對責任義務的不同感知；而同時考量「參加社團類別數」和「認識職業數」之後，仍然可以從日常接觸清楚辨別這種感知上的變異。但是這兩項畢竟都是最基本的測量數字，能否反映社會參與的不同類別與內涵？民衆對公民責任義務的感知，會不會隨著參加不同的社團、認識不同的職業類別，而有明顯差別？同時考量不同的社團和職業類別後，「日常接觸」的區辨效應是否仍然有效？爲了回應這些問題，本文在分析參加社團「數」和認識職業「數」這種基本指標之後，再依據社會參與的內涵，進一步檢驗不同參與形式的效應。

參加社團的效應除了可以從數目來區分之外，如何再從社團的類別或內涵來分辨？本文利用Mplus的潛在類別分析（Standard Latent Class Cluster Model）延續上述「公民責任義務的感知」探討，由資料分布結果（附表3）判斷，將受訪者按照「參與度」分爲兩類（「低參與度」和「高參與度」），以區別參加社團的不同組合，以及這些組合的差異性。分析過程中分別嘗試用五類社團（參見表4註3）和四類社團（不包括「其他自願性社團」）作對象。依據分析結果以及社團的性質，決定利用四類社團來分析更爲合理（尤其是考量到五類社團的最後一項「其他自願性社團」的性質不特定，難以判定社團的類別爲何）。至於「認識職業數」，則轉成以「認識職業的平均職業聲望」（依據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計算，Ganzeboom and Treiman 1996）。將這兩項代表社會參與形式「內涵」的新變項應用到「公民責任義務感知」的分析，或可

區分和原有的「參加社團類別數」和「認識職業數」有何不同結果。參與社團「高參與度 / 低參與度」和「參加社團類別數」的相關係數高達0.808，而「認識職業的平均職業聲望」和「認識職業數」的相關係數也達0.624；由於彼此相關過高，爲了避免共線性問題，在分析這兩組代表內涵的變項時，不再同時和代表數目的變項置於同一模型。

以參加社團的潛在類別替代參加社團數目作爲自變項之後，可以發現相對於「低參與者」來說，「高參與者」很明顯地贊同透過水平觀點來理解公民的責任義務（ $b=.208, p < .01$ , 表4，模型五），但是在垂直觀點上則沒有明顯區別（表4，模型六）。以「認識職業的平均職業聲望」取代「認識職業數」後，則發現能夠觸及較高職業聲望者，對於公民責任義務的感知，也有比較強的水平觀點（ $b=.003, p < .01$ , 模型五），但是對於垂直觀點還是沒有明顯區辨力（模型六）。因此，以參加社團或認識職業的「內涵」來瞭解對公民責任義務的感知，的確和原來單憑「數目」的分析結果不盡相同，尤其是「認識的人從事什麼職業」，要比單單去算「認識的人分布在多少不同的職業」來得更有區辨力。

另一項主要發現，是在以偏重「內涵」的變項來分析後，原有（模型三和模型四）單純以「數目」作爲測量指標的人口及社經背景並沒有任何明顯改變。例如水平觀點原有的性別和工作效應、垂直觀點原有的年齡和工作效應（模型五和模型六），都維持原來的顯著水準。和本文主旨更相關的發現，則是原有日常接觸的區辨效應，也幾乎都維持同樣的高度顯著，只有在垂直觀點的效應稍微不如原來的顯著（ $b=.064, p < .01$ ）。

因此，換成以著重「內涵」的指標來衡量參加社團和認識職業這兩項主要概念後，雖然對公民責任義務的感知有略微不同的區辨力，仍然

沒有改變「從日常接觸來區別這種感知」的有效性。換言之，以精簡的日常接觸變項來衡量社會參與，有助於辨別兩種不同的「公民應有責任義務」觀點。這種區辨力在同時考量基本的人口與社經地位指標之後，同樣有效。更重要的，不論再將「單純數目」或「考慮內涵」的其他社會參與形式指標一併納入分析，日常接觸的辨別力仍然保持高度顯著。

## 七、社會互動的異質化

「志願結社」和「社會資本」兩項重要概念，可以透過最基本的數目和較周延的測量來反映社會參與，進而多方檢驗不同社會參與形式的效應。至於「日常接觸」概念，是否也可以透過接觸人數這項基本數目之外的指標，來反映接觸對象的特質，特別是接觸對象的「異質性」？公民社會和政治民主的相關文獻類似，都強調異質環境提供公民和不同背景的人學習如何容忍（Stouffer 1955）。探討「參加社團」，其中一項核心概念也是試圖掌握這種特質，假設社團提供這種社會異質性和學習容忍的機會。

從參加社團數或參與的潛在類別，難以直接推論這種異質相處的結構因素。日常接觸總人數雖然也不直接涉及社會互動的異質性，但是人數多，通常也比較容易傾向異質化。依據社會網絡文獻，社會網絡愈大，內部的異質性也愈高（Kadushin 2012; Mutz 2002）。臺灣社會近年實證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個人網絡邊陲的弱聯繫代表這種異質成分，不論在家庭範疇或日常生活中都扮演重要角色（Fu 2009; Fu, Ho, and Chen 2013）。這種整體數量和實際組成的關聯，如何更直接地藉由實證資料來予以測試驗證？這項關聯，或許可以從「接觸對象中熟識者和陌生人的相對比例」來進一步分析。

前述13次問到日常接觸人數的變遷調查中，有6次調查延伸訪問「接觸對象中大概有多少是認識的」。依據前述合併後的三分類，6次調查合計大約有46.2%受訪者的日常接觸對象幾乎都是熟識者，34.2%大部分都認識，19.6%的日常接觸對象則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不認識的（表5）。分別比較第一類和第三類的歷年變化，發現「幾乎都認識」的比例在1997年時超過一半，到了21世紀降到40%出頭後，逐漸穩定。而「至少一半不認識」的比例，則從15.9%（1997年），持續上升到16.9%、20.1%、22.9%、27.0%（2010年）。上升的幅度雖然不大，但是趨勢相當清楚。第一類和第三類之間的差距變化更明顯，從1997年的38.5%，一直縮小為14.7%（2010年）（表5、圖3）。

**表 5 每天接觸對象中認識 / 陌生的比例 (%)**

調查年	1997	2000	2005	2006	2010	合計
1.幾乎都認識	54.4	47.7	41.6	40.9	41.7	46.2
2.大部分認識	29.7	35.4	38.3	36.2	31.3	34.2
3.至少一半不認識	15.9	16.9	20.1	22.9	27.0	19.6
樣本數	2,825	3,851	2,147	1,972	1,894	12,689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97年至2010年調查

註：「至少一半不認識」合併以下三選項：大約一半認識一半不認識、大部分不認識、幾乎都不認識。

和接觸人數的歷年變化（圖2）比起來，「接觸對象中幾乎都是熟識者的比例穩定、但陌生人比例逐漸增加」趨勢明顯，可能更能有效反映社會連結或互動的變遷特色，和社會參與的內涵也有更直接的關聯。首先，個人網絡中的核心成員通常相當穩定，不論是家人和其他親朋好友，都是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常數。臺灣社會中大約有四成民衆在日常生活中高度依賴這種核心網絡成員，或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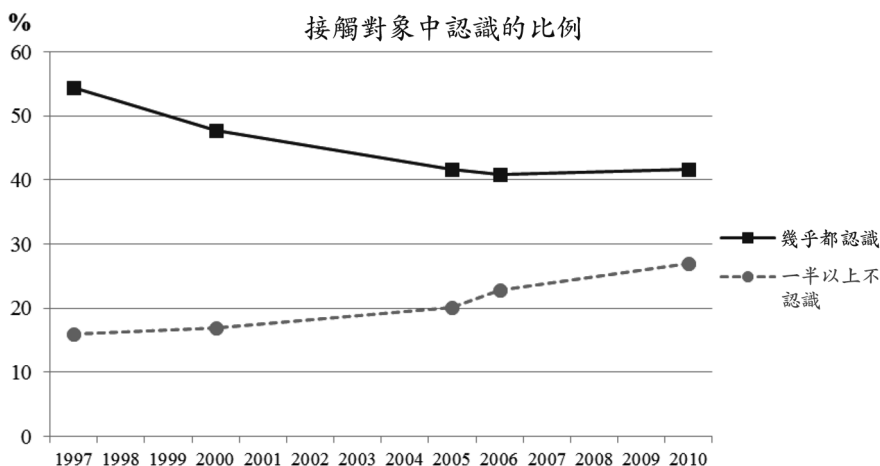


圖 3 臺灣民眾日常接觸對象中認識比例趨勢，1997-201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調查（每年比例詳見表5）

反映出家庭與社區的穩定力量。和陌生人互動的比例增加，也不免反映出在這種穩定的核心網絡之外，前述「短暫、片面、間接」的互動與連結，的確隨著新的傳播科技與工作、休閒、社交模式，讓愈來愈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有新的體驗。

其次，不熟識者有助於達成工具性的行動目的，也提供各種社會異質成分，讓當事人有機會認識、學習不同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Granovetter 1973, 1983; Lin 2001a; Freeman 2004; Burt 2004）。這種異質成分，正是孕育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一項客觀條件。臺灣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和陌生人互動的比例增加，或許也可以解釋為這種客觀條件逐漸普遍。

接觸對象異質化的現象，受到什麼樣的個人特徵影響，和不同的社會參與形式又有什麼關聯？本文最後嘗試以「陌生人比例」作為依變項，分析人口特徵及社經背景的效應，以及「加入團體數」和「日常接

觸人數」兩者和這種比例的關聯。依變項採用前述三個等第選項的分類（接觸對象幾乎都認識者為1，大部分認識者為2，至少有一半不認識者為3），數字愈大，代表日常生活和陌生人接觸的比例愈高。

依據等第邏輯（ordered logit）分析結果，陌生人接觸比例的人口和社經背景因素大致符合文獻所述：男性、年輕人、服務業、大都市居民都比較常和陌生人接觸（表6，模型七）。唯一的例外是教育程度：教育的效應本來是正向而顯著（ $p < .001$ ，表中未顯示），但是一旦加入年齡一併分析後，教育的效應不再顯著；再加入就業行業別，教育效應甚

**表 6 日常接觸對象中陌生人比例的等第邏輯分析**

（依變項：接觸對象中認識的比例，1=幾乎都認識，2=大部分認識，3=至少一半不認識）

自變項	模型七	模型八
男性 [女性=0]	.274(.087)**	.255(.089)**
年齡	-.039(.016)*	-.050(.017)**
年齡平方	.000(.000)	.000(.000)*
已婚 [其他=0]	-.056(.109)	-.103(.112)
教育程度(1-5)	-.125(.038)**	-.160(.040)**
就業行業 [無工作=0]		
農林漁牧	-.201(.194)	-.407(.200)*
製造營造	-.105(.122)	-.343(.127)**
服務	.573(.110)***	.183(.115)
都市化 [鄉村=0]		
城鎮	.140(.108)	.129(.110)
大都市	.266(.134)*	.318(.137)*
加入團體數(0-9)		-.059(.055)
日常接觸(1-6)		.515(.036)***
截距一	-1.708(.389)***	-.482(.408)
截距二	.108(.387)	1.483(.409)***
樣本數	2,143	2,132
Log Likelihood	-2186	-2068
擬R <sup>2</sup>	.033	.08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5年問卷一「綜合問卷組」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至變成負面。換言之，教育程度本身並不是提升接觸對象異質化的背景因素，而是透過就業的行業別來顯示這種傾向；加上臺灣社會中教育程度和年齡呈現高度負相關（教育程度和年齡、年齡平方兩項變項的相關係數都高達  $-0.60$  左右），一旦考慮年齡因素後，反而是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愈有可能接觸到陌生人。

原有的分析再加上兩種社會參與形式為自變項後，人口及社經背景中只有就業行業別效應有所改變：在服務業工作，很明顯地要比其他行業有更多機會接觸到陌生人，可是服務業員工的日常接觸人數相當高（相關係數約為  $0.268$ ），一旦也考慮接觸人數，在服務業工作本身並不一定就會跟較多陌生人接觸（而是因為接觸的總人數比其他行業多，所以也會接觸到較多陌生人）。反之，一旦考量接觸人數後，農林漁牧業和製造營造業員工接觸陌生人的比例，反而不如沒有工作者（表6，模型八）。

兩種社會參與形式的效應之間則有明顯差別：加入社團的類別數量和接觸陌生人的比例幾乎無關，日常接觸的人數則明顯和陌生人比例成正比。在沒有加入任何社團的受訪者當中，大約有  $20.5\%$  每天至少有一半的人際接觸對象是陌生人，而有加入社團的受訪者，也只有  $19.1\%$  左右過著這種經常接觸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相形之下，日常接觸的區辨力明顯得多：每天接觸  $0-4$  人的受訪者當中，只有  $4\%$  說接觸的人裡面至少有一半是陌生人；接觸  $5-9$  人的有  $10\%$ 、 $10-19$  人的有  $17\%$ 、 $20-49$  人的有  $22\%$ 、 $50-99$  人的有  $40\%$ 、 $100$  人以上則有  $50\%$  說接觸對象有一半或以上都是陌生人。

如果同時考量背景因素和加入團體數，日常接觸人數每高一組，等第邏輯係數就增加  $0.515$ 。換句話說，和接觸  $10-19$  人的受訪者相比，接觸  $50-99$  人的受訪者「接觸對象中陌生人所占比例」的係數要高出  $1$  左

右，等於是整整升高了一組比例；而和每天接觸0-4人的比起來，接觸100人以上者的「接觸陌生人比例」則高出2.5個係數左右，等於是從最低的比例，升高到最高的比例，等第邏輯係數的效應值（effect size）相當可觀，也達到 $p < .001$ 的統計檢定水準（表6，模型八）。

因此，雖然日常接觸總人數本身只是代表一項數字，卻對接觸對象的異質化有明顯而重要的意涵。接觸人數愈多，愈有可能跨出平常熟悉的社會圈，和原本不熟識的人互動。同時透過「日常接觸總人數」和「接觸對象的陌生人比例」這兩項指標，可以從量和質兩方面分析社會互動的異質化，更完整地探索社會參與。

## 八、結論

臺灣民衆近二十年來「參加社團的比例」下降，是否反映社會參與式微，不利於公民意識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本文依據變遷調查資料，首先審視兩種社會參與形式的變化趨勢，發現雖然「社團參加率」下降，「日常接觸人數」卻維持平穩，甚至略微上升。由於日常接觸涵蓋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互動，如果「參加社團」這種正式社會參與形式有式微傾向，而「日常接觸」揭示出全面的社會參與穩定或略微上升，則整體社會中「非正式」或「團體之外」的社會互動也應該有比較明顯的增加。

以「政治效能強度、討論公共議題頻率、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為例分析，初步肯定「日常接觸」和「志願結社」同樣能夠有效分辨民衆有關這些反映公民意識的態度和行爲。公民意識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潛能，除了藉由文獻上慣用的社團參與加以探討之外，也應該顧及涵蓋面更廣、同時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社會互動的「日常接觸」。

本文分析兩種社會參與形式，在理論依據上兼顧團體參與和社會網絡兩大研究傳承。「志願結社」或「參加社團」容易測量，既成的問法在社會科學界已沿用數十年。社會網絡則涵蓋甚廣，在測量上複雜許多。「日常接觸」問項基於社會網絡的研究傳承及觀點，在概念化及測量設計上兼具理論基礎，尤其是強調公民不必加入社團，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場域經常和人接觸、談論社會議題、關心公眾事務。如此擴大範圍，不僅是衡量志願結社在各個社會的發展不盡相同，也考慮到部分民衆（尤其是弱勢社群）受到各種結構限制或經濟障礙，不容易有機會參加正式社團。即使社會上有大部分民衆都不參加任何社團，還是可以藉由日常接觸來區辨這些民衆的內部差異。同理，對那些參加眾多社團的民衆來說，日常接觸也可以涵蓋所有社團內外的任何活動，進一步區辨其群體內部的變異。

「日常接觸」在設計上設法克服施測困難，實際操作時緊扣「日常生活」和「所有人際接觸」兩項清楚原則，測量簡潔而直接。以六項等第類屬來測量總人數，對絕大部分的受訪者來說清楚易懂，跟最基本的個人背景變項（例如年齡）有同樣高的有效回答率。施測結果密切呼應其他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進而涵蓋形形色色的社會參與內容，直接應用在各種不同分析，比「參加社團」受限於正式團體內的互動來得廣泛而周延。換言之，本文所比較的兩項社會參與形式並不互斥，而是各有特色。參加社團可以多和人接觸，也可以藉機結識陌生人；如果每天參加社團，則在社團內的互動自然也納入日常接觸的範圍。但是如果只是社團的成員，卻幾乎不參加社團活動，則不具有「人際接觸」的實質意義。若干實證研究採用「社團成員身分」作為測量指標，嚴格說來並不能有效反映社會參與的行動面。相形之下，「日常接觸」清楚測量實際發生的社會互動。

日常接觸問項偶而經過修訂，施測結果和單一問項比較時難免受限。例如將接觸對象區分為「親屬」和「非親屬」後再分別測量人數，用來分析政治效能強度和討論公共議題頻率時，結果不盡一致。同樣是公眾議題，有時候是接觸親屬人數比較重要，有時候又是接觸非親屬人數較為關鍵。如此劃分為親屬或非親屬，固為辨認社會網絡成員的重要標準，但是如果將這兩項用來分別施問平均接觸人數，反而不夠直接了當，增加受訪者思索判斷的難度，施測結果分布也不盡均勻。此外，「接觸非同住親屬人數」的偏態係數偏高，也不如日常接觸單一變項的分布來得均勻，不利於進一步分析。

「志願結社」和「日常接觸」的形式或類別都容易隨著時代或社會脈動而改變，尤其是網際網路興起後，在網路上的各種參與和接觸益形普遍。設計及測量操作時如何考慮納入各種形式，都將影響時序上的前後比較結果。變遷調查的2012年問卷問到所參加的社團時，加註「網路上的社團也算」，固然反映出21世紀的最新趨勢，但是網路在20世紀末即興起，而之前的調查並未明白列入為計算範圍，難免造成前後比較的基準不一致。相形之下，日常接觸的形式與類別問法簡便，前後十幾年的施測標準一致，有利於精確呈現長期趨勢。而隨著整體社會持續網路化，在網路上的社會互動益趨頻繁而多樣，這項趨勢是否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不同形式的人際接觸？後續研究如何更精確地區辨不同類型的日常接觸，這些類型又和公民意識的孕育有何關聯？都值得再進一步規劃。

網路上最新的社會互動場域，首推各類型社群媒體（或稱「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社會運動經常透過臉書、微博、推特、LINE等媒體作為聯繫平台，以號召群眾及時參與活動。這種特殊的人際接觸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動員模式，似乎讓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益加鮮明。這些新興社會現象及其他類似發展，或許可以為後

續的公民意識研究注入新思維。本文限於探討若干人口社經背景以及社會參與形式，固然有一部分可以有效區辨民衆的公民意識，還是有許多背景因素尚未探索。例如「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背景」（表4）的整體變異量，最多只有6.2%左右（調整後R平方）可以藉由本文探討的背景因素加以解釋。在未知的背景機制當中，還有哪些因素有助於強化公民意識，也是值得後續探討的另一項重要議題。

「日常接觸」這項新創的概念只以「人數」粗略估計社會參與的程度。接觸愈多人，不但愈能將社會圈延伸到「陌生人」，這些陌生人裡面還可能包括和自己背景、理念、價值觀互異的「異類」。本文另外依據社會互動中熟識者和陌生人的相對比例，直接顯示近年來臺灣民衆和陌生人接觸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和陌生人接觸增加，代表社會互動的對象趨向異質化，應該有利於學習如何和他人相處、如何尊重容忍不同意見這些公民社會的重要特質。這種社會互動的異質化，難以從「參加社團」指標窺知一二，卻和日常接觸總人數密切相關。而從接觸人數的變化，便初步看出整體社會參與的趨勢穩定，對公民意識及公民社會發展有重要意涵。至於社會互動異質化和容忍等公民社會的重要特質有何關聯，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分析。

本文一方面從社會網絡取徑，擴展有關公民意識及公民社會的研究視野，另一方面藉由公民意識的探討，揭示如何從社會互動的異質成分來瞭解民主社會發展的基本議題。所謂社會異質指標，在社會網絡文獻中一向藉由繁雜的資料收集及方法來建構，而不常出現在一般研究。本研究所用的異質化指標則相當簡明易懂，不論就資料收集、整理、分析過程而言，絕大部分研究者都可以有效掌握。網絡異質化指標在概念化及測量的「精簡度」及「信效度」之間如何達到平衡，將是研究者必須仔細評估的另一關鍵。

和「志願結社」有關的研究途徑源自歐美高度民主化國家，這種研究途徑是否通用於不同時空的各國政經背景和社會環境？社會參與的測量如何經得起種種時空差異的挑戰，可能是實證社會科學的艱難議題之一。本文以涵蓋周延、適用於各種社會參與形式及內涵的「日常接觸」取徑為例，說明這項問項如何補足「志願結社」的研究取徑。尤其是現代社會中有愈多民衆透過非正式的互動參與社會活動，這種非正式的小型互動場合沒有明顯階層組織、內部結構鬆散、「成員」也沒有明顯的責任義務，似乎呼應著最近文獻上有關新興科技傳播影響下的社會參與形式。日常接觸的概念化及設計受到這種新興社會現象的啓發，在實證測量及經驗分析則源自臺灣。後續分析研究如何進一步推向其他國家社會，將是另一挑戰。

### 作者簡介

傅仰止，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以社會網絡為主。近年研究分別透過抽樣調查與接觸日誌，探討日常生活中人際接觸型態的形塑及效應。研究取徑除了從個人層次著手，並細分「個人間的聯繫」與「聯繫下的接觸」兩項概念及分析單位，剖析社會網絡的結構性原理以及日常接觸的實用價值，包括類流感的傳染途徑等。



附表 1 臺灣民眾參加社團比例，1990-2012 (%)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2012
至少參與一社團	48.3	47.6	48.3	43.3	45.9	32.3	30.0	36.2	35.5
情感性	15.9	13.2	18.1	11.4	17.2	11.2	13.6	16.3	18.3
宗親會	5.8	3.6	5.2	3.2	4.0	1.7	2.8	3.1	2.9
宗教團體	8.3	7.7	11.2	7.4	11.5	8.5	9.9	12.5	15.4
同鄉會	2.8	2.4	2.2	1.4	2.0	1.3	1.6	1.5	0.9
祠堂祭祀	2.2	1.3	2.2	1.2	1.1	0.8	0.7	1.4	-
工具性	39.7	41.8	38.4	37.7	36.2	25.3	22.0	27.1	22.6
職業團體	25.1	20.0	25.5	20.1	21.8	10.7	9.8	12.3	6.1
康樂團體	4.3	3.2	5.3	3.2	5.6	4.3	5.3	3.2	5.1
校友會	9.2	6.2	5.9	2.6	6.5	4.3	3.5	5.4	5.1
社會團體	3.5	5.4	4.1	4.9	7.8	5.3	6.8	4.6	10.8
政治團體	7.9	20.4	6.4	16.6	4.6	7.6	1.5	8.6	1.5
樣本數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720

資料來源：依據熊瑞梅等（2010，表2）分類標準，更新計算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調查結果

附表 2 因素分析摘要

## A. 建構表3模型—依變項（政治效能）的因素分析

85.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對公民權利、政府與鄰里的觀念或看法？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有點同意, (4)有點不同意, (5)不同意, (6)非常不同意

原題項	因素負荷量	
	鄰里互動	政治效能
a. 像您這樣的人對政府的作為是沒有影響力的	-.0063	.7120
b. 對您來說要瞭解政府與政治的運作實在太複雜了	.0824	.8006
c. 您個人對政治方面有興趣	-.0040	-.6346
d. 您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4329	-.1750
e. 您的村里鄰居都會互相關心	.8973	.0577
f. 您的村里鄰居在您需要的時候會提供幫忙	.8994	.0365
固有值	1.805	1.583
解釋變異量 (%)	30.1	26.4
Alpha	.628	.532
樣本數	1,872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問卷一「社會階層組」

## B. 建構表3模型二依變項（討論公共議題）的因素分析

81. 在過去一年內（去年8月到現在），針對下列（社區或地方）議題，請問您常不常參與團體討論（三人以上正式或非正式的討論）？

(1)從未有過討論, (2)一年有幾次, (3)每個月都有, (4)每星期都有

因素負荷量	
a. 環境議題	.8378
b. 教育議題	.8498
c. 治安與防災議題	.8657
d. 消費者權益議題	.8340
固有值	2.869
解釋變異量 (%)	71.7
Alpha	.863
樣本數	2,083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問卷一「社會階層組」

## C. 建構表4模型三至模型六依變項（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的因素分析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公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如果1表示「一點都不重要」，7表示「非常重要」；那麼，請問您個人認為下列各種做法，對作為一位好公民有多重要？

	因素負荷量	
	水平觀點	垂直觀點
a. 選舉都去投票	-.0320	.7026
b. 從不逃漏稅	-.0842	.8045
c. 遵守法律與規定	-.0361	.7858
d. 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	.2927	.4814
e. 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	.5787	.1351
f. 儘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	.6783	-.0058
g. 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為了政治的或倫理（道德）的或環保的考慮去買	.6497	.0497
h. 幫助國內（台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	.7483	.0267
i. 幫助世界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	.8180	-.1796
固有值	3.259	1.328
解釋變異量 (%)	36.2	14.8
Alpha	.662	.729
樣本數	1,640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4年問卷一「公民權組」

附表 3 社團參與程度的潛在類別分析

潛在類別	合計	參加社團數, N(%)				
		0	1	2	3	4
低參與度(1)	1,455(81.7)	857(58.9)	562(38.6)	36(2.5)		
高參與度(2)	326(18.3)			216(66.3)	92(28.2)	18(5.5)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4年問卷一「公民權組」

## 參考書目

- 林宗弘，2012，〈非關上網？台灣的數位落差與網路使用的社會後果〉，《台灣社會學》24: 55-97。
-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的三地比較〉，《臺灣社會學刊》45: 117-162。
- 侯佩君、杜素豪、廖培珊、洪永泰、章英華，2008，〈台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計畫之抽樣分層效果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3: 7-32。
- 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2013，〈導讀〉。頁v-xix，收錄於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編，《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爲，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4》。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章英華、傅仰止，2006，《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章英華、傅仰止、張苙雲、瞿海源，2012，〈附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演變（1985-2011）〉。頁325-357，收錄於伊慶春、章英華編，《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家庭與婚姻，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1》。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臺灣社會學刊》44: 55-105。收錄於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編，2013，《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爲，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4》，頁283-328。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Burt, Ronald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4): 293-339.

Burt, Ronald S., 2004,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2): 349-99.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5-21.

Durkheim, Emile, 1893 (196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_\_\_\_\_,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2<sup>nd</sup>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reeman, Linton,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Vancouver, Canada: Empirical Press.

Fu, Yang-chih, 2005a, "Measuring Personal Networks with Daily Contacts: A Single-item Survey Question and the Contact Diary." *Social Networks* 27(3): 169-186.

\_\_\_\_\_, 2005b, "Daily Contacts as a Proxy Measure of Personal Networks: Data from 46 Surveys in Nine Societies." Paper presented at 2005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Mexico City, Mexico, April 3-6.

\_\_\_\_\_, 2009, "The Immediate Returns on Time Investment in Daily Contacts: Exploring the Network-Overlapping Effects from Contact Diaries." Pp. 327-347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Hsung, Ray-May, Nan Lin, and Ronald Brieger, eds. London: Routledge.

- Fu, Yang-chih, Hwai-Chung Ho, Hsiu Man Chen, 2013, "Weak Ties and Contact Initiation in Everyday Life: Exploring Contextual Variations from Contact Diaries." *Social Networks* 35(3): 279-287.
- Ganzeboom, Harry B.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 201-239.
- Goffman, Erving,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 Chicago: Aldine Pub. Co.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33.
- Huddy, Leonie, and Nadia Khatib,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 63-77.
- Kadushin, Charles, 2012, *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s: Theories, Concepts, and Fin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umann, Edward O.,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Letki, Natalia, 2004, "Socialization for Participation? Trust, Membership,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Central Europ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7: 665-679.
- Lin, Nan, 2001a,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1b,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Pp. 3-29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in, Nan, and Mary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 365-385.
- Lin, Nan, Yang-chih Fu and Ray-May Hsung, 2001, “The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Pp. 57-82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in, Nan, Yang-chih Fu, and Chih-jou Jay Chen, 2014, “Social Capital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3-18 in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y: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edited by Nan Lin, Yang-chih Fu, and Chih-jou Jay Che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Lofland, John, 1976, *Do Social Life: Qualitativ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Natural Setting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Lowndes, Vivien, 2004, “Getting On or Getting By? Wom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1): 45-64.
-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435-463.
- McPherson, J. Miller, and Lynn Smith-Lovin, 1987, “Homophily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Status Distanc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Face-to-Face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3): 370-379.
- Morales, Laura, and Peter Geurts, 2007, “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 Pp. 135-157 in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A*

-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Jan W. van Deth, Jose Ramón Montero, and Anders Westholm, ed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Mutz, Diana C., 2002, "Cross-cutting Social Networks: Testing Democratic Theory in Pract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 111-126.
- Newton, Kenneth,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575-586.
- Paxton, Pamela,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54-277.
- Pescosolido, Bernice A., and Beth A. Rubin, 2000,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Revisited: Social Life, Postmodernism, and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52-76.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iegel, David A., 2009,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1): 122-138.
- Simmel, Georg, 1908 (1971), "Group Expan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Pp. 251-293 in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22 (1955),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Translated by Reinhard Bendix. Pp. 127-195 in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edited by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 Stouffer, Samuel, 1955,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